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

金銅佛·上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

2

金銅佛・上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

第2卷 金銅佛·上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者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編 100011)

(網址 WWW.bph.com.cn)

主編 楊新 王家鵬

責任編輯 于福庚 張秋月

排版者 北京景煌激光照排有限公司

製版者 天時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印刷者 天時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裝訂者 天時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發行者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二〇〇二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80501-228-8 / J·222

國內版定價 三六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編輯委員會

顧問

拉巴平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

却西活佛（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院長）

那倉活佛（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院長）

王堯（中央民族大學藏學教授）

朱述新（北京出版社社長）

主編

金維諾（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總編委會委員）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副主編

丹珠昂奔（國家民族翻譯局局長）

甲央（西藏自治區文物局局長）

委員

左漢橋（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副總編輯）

楊新（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張建林（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曾任西藏自治區文物普查隊副隊長）

王家鵬（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副研究館員）

謝繼勝（藝術學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

熊文彬（藏族 藝術學博士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副研究員）

李翎（魯迅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副教授）

廖暘（藝術學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蘇發祥（藏族 民族學博士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宗同昌（故宮博物院攝影師 曾為西藏自治區文物普查隊成員）

仵君魁（甘肅藏傳佛教文化基金會副秘書長 曾為西藏自治區文物普查隊成員）

主 編 本卷由故宮博物院編
楊 新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王家鵬 (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副研究館員)

凡例

一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的重要組成部份，共六卷。主要按佛造像時代、材質分別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藏傳佛教雕塑藝術特色及其發展面貌。

二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和寺院、文博珍藏品為主，同時包容有代表性的民間精品；既要考慮藏傳佛教雕塑特色及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佛造像的不同造型內容和出土地區。

三 《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在年代劃分上，以考古發掘報告、考古類型學、佛寺院遺址、建築年代及佛寺、博物院、民間收藏記載並參照造像風格為原則。在佛造像的名稱上，力求按有關佛教典籍及記載適當加以規範。故宮博物院所藏金銅佛名稱均以黃條記載為準。有些難以確定的，暫以各卷所擬相關定名或加以時代推斷，供研究者參考。

四 本書為《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第二卷，全部選錄故宮博物院歷年珍藏藏傳金銅佛精品。

五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份：一為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並附《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漢、藏、梵文佛像名稱索引。

序

楊新

在故宮博物院豐富的歷史文物收藏中，屬於藏傳佛教的文物尤為大宗，其中僅金銅造像一項就多達數萬件，而且都是清代宮廷所遺留下來的。藏傳佛教文物之所以收藏之富，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元、明、清三代的中央政權，都與藏傳佛教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藏傳佛教文物，除了從西藏等地區源源不斷的朝宮廷敬獻之外，同時宮廷中也源源不斷的生產製造，此中又以清代為最。

宮廷對藏傳佛教的興趣，首要是出於政治的目的。西藏在歸元政府直接統治之後，西藏的佛教領袖八思巴，即被尊為「國師」。明代在建國之初，亦繼承元制於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年）封帕木竹巴僧章陽沙加為國師。之後還制定僧官制度。至於清王朝與藏傳佛教的關係，則更為密切，只要看順治皇帝專為五世達賴在北京建造西黃寺，康熙、乾隆兩朝在承德避暑山莊建造一系列喇嘛廟，就可知非一般了。正是有這樣一個深遠的歷史背景，所以，在宮廷中收藏的藏傳佛教金銅造像，不但數量多，而且來源地區廣、時代久遠和連綿不斷。

實際上藏傳佛教也是宮廷中精神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宮廷婦女更為需要。宮廷中有那麼多的皇后皇妃，皇太后、皇太妃，太皇太后、太皇太妃，以及宮女嬪娥等，她們被禁閉在深宮中，連家人親屬都難得一見，精神將何所寄托？永日將何以消磨？所以，拈香拜佛、打坐念經，就成為了她們的日課，頻頻的佛事舉行，亦為她們提供了集體活動見面的機會。只要看內廷中佛樓、佛殿林立，寢宮中佛堂、佛龕隨處可見，便知其中奧秘。如今紫禁城的后宮中，尚保留有清代佛樓、佛殿、佛堂三十餘處，就可想知當時的興盛了。宮廷中鑄造金銅佛像、繪製唐卡等，既是為了頒賜，也是為了自需。由於它握有最豐厚的財

力資源，有一批高手藝的能工巧匠，故宮廷所鑄造的金銅造像既精且美。不但有名貴的材
料，如黃金、寶石之類，而且精湛的鑄造工藝，形成宮廷獨有藝術風格和特色，如永樂、
宣德時期鍍金藏傳佛教造像，至今仍受人們的喜愛。

藏傳佛教造像種類繁多，大同小異，難以識別。早在乾隆時代，就曾請西藏高僧對
元、明以來收藏的藏傳佛教造像進行識別，並標上黃簽條。同時，在新鑄造的佛日樓、梵
華樓等整堂數千新造像，均一一刻明所造佛像的名字。乾隆皇帝此舉是為其子孫後代計，
他未曾想到，却為今天的學術界保存了極為珍貴的研究資料。在這一點上，乾隆弘曆的認
真求實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長期以來，故宮博物院所珍藏的這份豐富的文化遺產少為外人所知。直到改革開放以
後，一九九二年故宮博物院第一次舉辦《清宮藏傳佛教藝術展》，同時出版了《清宮藏傳
佛教文物》圖錄，向社會公開了這一份秘藏，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興趣。

此次《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將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金銅造像專列為一卷，正是考
慮到這一部份收藏，不但能够自成體系，而且獨具鮮明特色。在選編過程中，為了便於讀
者檢索和進行對比研究，在按照時代先後次序排列時，尤其注意大部採用有明確紀年銘文
的作品。這樣，對於探索不同藝術形式和風格，深入研究其歷史時代的演變和發展，為藏
傳佛教藝術的弘揚將是大有補益的。

故宮藏傳金銅佛像概論

王家鵬

青藏高原神奇壯美，人傑地靈，勇敢智慧的藏族人民在世界屋脊上創造了舉世聞名的藏傳佛教雕塑藝術。以泥、石、木、金銅各種材質的佛像雕塑為代表，其中數量巨大流傳廣泛，最具代表性的當數金銅佛像。一千多年來藝術家們創造了難以數計的金銅佛像藝術珍品，凝聚了藏族人民卓越的藝術才智，充分表現了西藏雕塑藝術的輝煌成就。藏傳金銅佛像造型神奇豐富多彩，有着與漢地佛像迥然不同的藝術風貌，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獨特的高原地域特徵。

藏傳佛教是中國佛教中重要一系，七世紀中葉佛教從中原和印度南北兩路傳入西藏高原，至今已有一三〇〇多年的歷史。佛教經歷了同藏族原有的本教的鬥爭和融合，也經歷了佛教內部教派的分化和消長，逐漸扎根於西藏高原，扎根於藏族人民心中，形成具有獨特思想體系的藏傳佛教。其發展史分為前弘期與後弘期兩段，前弘期從七世紀至九世紀中葉吐蕃贊普郎達瑪奉行滅佛政策，吐蕃佛教遭受沉重打擊為止。其後吐蕃陷於混亂與分裂之中，吐蕃政權土崩瓦解，佛教在西藏滅寂百餘年。自十世紀末纔逐漸經西康、青海和阿里上下兩路重新弘傳復蘇，為後弘期開端。後弘期西藏佛教直接傳承東印度帕拉王朝盛行的無上瑜伽密教，並以密教的不同傳承逐漸形成各教派，修建了眾多的寺院，注重佛像陳設，客觀需求推動了造像藝術的發展。

藏傳佛教藝術的傳播與佛教歷史發展同步，元代以後隨着藏傳佛教東傳，藏傳佛教藝術廣泛流傳於我國內地廣大地區。故宮是明、清兩代皇宮，由於歷史的機緣保藏了大量的藏傳金銅佛像，是我國西藏之外收藏藏傳佛教造像最豐富的國家博物館。故宮藏傳佛像作為皇家收藏，保存紫禁城長達數百年，由於這些文物主要來源於清代西藏、蒙古等地的貢



插圖一 寶勝寺嘛哈噶拉樓

品和元、明、清三代宮廷作品，彙聚了藏區及內地的佛像藝術精華，形成了故宮藏傳佛像的鮮明特色，既有突出的西藏佛教藝術風格，又融會了漢、滿、蒙等各民族及域外藝術風貌，珍品薈萃，有不同時代、產地、風格的造像。既有大量西藏與內地作品，還有西藏周邊地區印度、尼泊爾等地的古代佛像。時代跨度大，產地衆多，品類豐富形成系列，集中反映藏傳金銅佛像藝術發展的脈絡，顯示各時代不同地區藏傳佛像的造型藝術特點與成就。除了藝術價值外，這批古代佛像還蘊涵豐富的中外歷史文化交流的信息，在我國藏傳佛教金銅佛像研究中具有無法替代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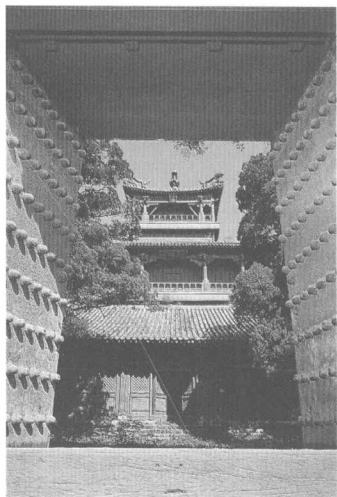
一 清代宮廷藏傳佛像的來源與特點

(一)

藏傳佛教歷史悠久，流傳地域廣大。不僅廣泛流傳在青藏高原，十二世紀已流傳西夏，在西夏王朝佔有重要地位。十三世紀以後，藏傳佛教更得到元、明、清三代朝廷的尊重扶植。清王朝把『興黃安蒙』作為一項重要的治理邊疆政策，扶持藏傳佛教，借助其佛教影響力有效治理蒙、藏邊疆地區，同時促進內地與西藏的文化交流，藏傳佛教也以其博大精深文化在清宮廷中扎下根。

清王朝十七世紀初崛起於遼東，原來信仰薩滿教，與其比鄰的東部蒙古地區，藏傳佛教已十分發達，與後金敵對的察哈爾林丹汗部早在阿拉坦汗時期就已接受了藏傳佛教。在遼東地區，也已傳入藏傳佛教，隨着後金勢力的不斷擴大，許多蒙古喇嘛投奔到太祖努爾哈赤麾下。為招徠蒙古諸部，努爾哈赤極力推崇藏傳佛教，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西藏大喇嘛幹祿打兒囊素，率徒衆從東蒙來到遼陽，投奔太祖，得到太祖的尊重供養，圓寂後為其修建寺塔，立碑紀念。天聰八年（一六三四年）太宗皇太極征服蒙古林丹漢部，獲得元初八思巴所鑄嘛哈噶喇金像。皇太極特建嘛哈噶喇樓及寶勝寺供奉（插圖一 寶勝寺嘛

插圖二 清宮佛殿雨花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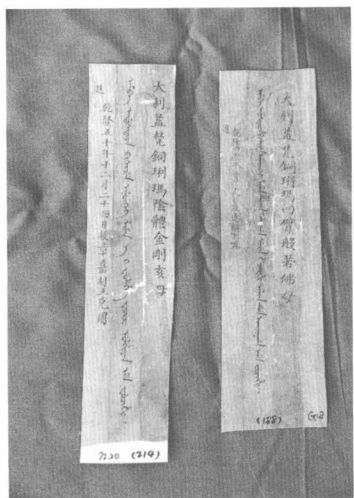
插圖三 梵華樓



哈噶拉樓）。這是最早為清代宮廷供奉的藏傳金銅佛像。到實勝寺禮佛，成為清帝在盛京的重大祭祀活動。崇德四年（一六三九年）皇太極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一六四二年）隆重接待衛藏使者。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太宗在盛京周圍敕建四塔四寺：東塔永光寺、西塔延壽寺、南塔廣慈寺、北塔法輪寺，全部為藏傳寺院。可見在清初，主要出於政治原因，藏傳佛教已深得清帝重視。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清宮廷設立專門管理宮廷藏傳佛教事務的機構『中正殿念經處』，主管宮廷喇嘛念經，辦造佛像。乾隆時期又設立雍和宮管理王大臣一職，專管雍和宮佛教活動。佛事活動的制度化，表明藏傳佛教在宮廷中影響重大。在宮廷內部，由於清初實行滿、蒙聯姻之策，后妃們大多來自蒙古科爾沁部，她們原來就信仰藏傳佛教，自然把佛教信仰帶入清宮廷。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為其祖母孝莊皇太后祝壽，特作西藏佛像四臂觀音（見圖一九六），像底座下沿刻漢、滿、蒙、藏四種文字銘文，清楚地說明孝莊皇太后信仰的是藏傳佛教。另一方面，中正殿念經處的建立，表明皇室宗教信仰的變化，傳統的原始薩滿教已滿足不了皇室的宗教需求。到乾隆時期，清代宮廷中藏傳佛教影響達到高峰，表現在以下諸方面：（一）遍佈宮中的佛殿。紫禁城中修建眾多的藏傳佛教殿堂，中正殿、雨花閣、寶相樓、吉雲樓、梵華樓、佛日樓等三十多處佛堂，京城皇家御苑中也梵剎林立。乾隆十五年前後還特建滿族喇嘛寺院，喇嘛全由滿族擔任，誦滿文大藏經①（插圖二清宮佛殿雨花閣、插圖三梵華樓）。（二）頻繁的宮廷佛事。每天都有喇嘛在皇宮御苑中念經作佛事，每年達二千多人次。帝后們到佛堂捻香拜佛，聆聽喇嘛誦經，觀看法事，直至清末仍未停止②。（三）豐富的佛教文物典藏。宮廷佛殿中供滿數以萬計的藏傳佛教文物，彙聚藏、蒙地區以及內地的藏傳佛教珍品。佛經、佛像、法器，『凡是西藏有的這裏無所不有』③，其中金銅佛像尤為豐富。這是藏傳佛教文化在宮廷的深刻影響的結果，沒有共同的佛教信仰，是不可能保存下如此豐富的藏傳佛教文物的。

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藏傳金銅佛像主要來源如下：（一）清代藏、蒙等地貢品。自元以來西藏與中央政府聯係交往日益密切，西藏各派佛教首領，民族上層紛紛赴京向皇帝



插圖四
佛像黃條

進貢，接受朝廷封賞，現存佛像主要是清代貢品。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年）五世達賴進京朝覲，得到朝廷封號，確立達賴喇嘛在西藏佛教中的領袖地位，以後朝貢不斷。清朝訂立年班制度，規定達賴、班禪每隔兩年輪流入貢，蒙古王公幾年一貢，這是繼承元代以來的傳統。藏族地區佛教上層為取得朝廷的封號，提高自己的地位，頻繁入貢，朝廷給以豐厚的回賞。佛像、唐卡、法器等，是進貢朝廷的主要物品。歷經幾百年漫長歲月，西藏的佛教藝術精品點點滴滴匯入紫禁城，並被完好地保存在皇宮這一封閉的特殊環境中，這些佛教文物的歷史文化內涵深厚，既顯示西藏佛教藝術的輝煌成就，又真實反映清王朝治理蒙、藏邊疆的歷史進程，生動說明在清代多民族統一的歷史條件下，漢、滿、蒙、藏等各民族文化的密切交流。（二）元、明兩朝宮中舊藏與清代宮廷製作：藏傳佛教自元代傳入內地，得到元、明、清三代皇室的尊崇。從元至清末六百多年中，西藏佛教文化深刻影響宮廷生活，宮中佛事活動不斷，元代梵像提舉司、明代御用監佛作、清代中正殿念經處，都是皇帝專設辦造佛像的機構，製作大量的佛像。現存的佛像主要是清代宮廷作品。

故宮佛像的首要特點是保留清代喇嘛高僧的鑒定記錄。根據文物實況與清代文獻記載，藏傳佛像貢進皇宮後，要請章嘉、土觀、阿旺班珠爾等駐京胡圖克圖鑒定，然後用漢、滿兩種文字在黃色紙條上寫明佛像品種、名稱、來源、時間，拴在佛像上（插圖四 佛像黃條）。有的在佛像底板處貼白綾寫佛名，或在佛龕上用漢、滿、蒙、藏四體文字刻寫銘文。據《章嘉國師若必多傑傳》記載，清代宮廷佛像的大量鑒定標名工作始於乾隆時期：

『乾隆帝降旨說：「漢人、蒙古諸朝以來，至今宮廷內漸次供養之佛像、佛經、佛塔等不可勝數，造像材料和各像面目無法識別，難以整理。請將這些佛像分別開來，用蒙藏兩種文字標出名號。」於是，由章嘉活佛為首的赤欽活佛等駐京高級喇嘛及理藩院的文書謄寫人員，用了兩個月時間，仔細察別。具樣進呈，甚合帝意，嘉獎殊厚④。』

清宮檔案中記錄許多佛像的鑒定過程：

『雍正元年，……怡親王交銅古佛一尊……五塔寺阿撒拉達喇嘛認看同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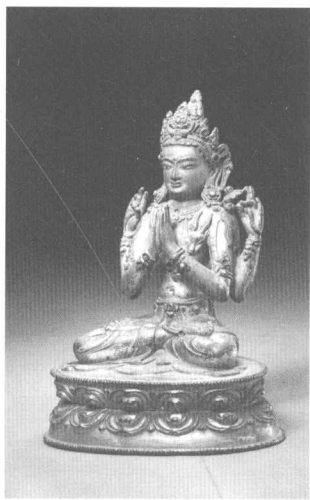
佛係文殊菩薩，背後刻之字係迦毗羅國字，字義是佛心咒語^⑤。」顯然這是一尊刻有梵文的古印度佛像。

『乾隆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和碩果親王將內廷交出紫檀木龕一座，奉旨着張家（章嘉）胡圖克圖認看，佛像背後刻四樣字，欽此^⑥。』

三世章嘉若必多傑是清代著名的佛教大師，是清代北京、山西、內蒙地區藏傳佛教最高活佛，與宮廷關係密切，他是乾隆皇帝修習藏傳佛教的上師，也是他的佛教顧問，親自指導乾隆時期宮廷佛殿的建築、佛像、法器的製作。主持翻譯滿文大藏經，親自編撰《諸佛菩薩聖像讚》《三百佛像集》等造像學著作。精於佛像的繪塑與鑒定，如《章嘉傳》所載：

『他只要用手觸摸一下，就能查知佛像等物品製作的好壞，區別出是印度的還是用西藏的新舊銅料製作的^⑦。』

乾隆皇帝本人對藏傳佛像鑒定極為重視，使得清宮佛像上保留大量黃條和佛龕題記，留下清代高僧的鑒定記錄，反映清代藏傳佛教高僧對佛像的認識與研究水平。就章嘉等清代高僧的佛學與造像學水平而言，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經他們確定的佛像名稱與分類，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藏族傳統與漢族不同，漢地佛像多有紀年題記，可為斷代提供可靠依據，而藏傳佛像極少題記，除少量漢文款識有紀年外，罕有紀年。國內現存藏傳金銅佛像數量巨大，收藏分散，全為傳世品。收藏於世界各博物館從西藏流散出去的佛像，更難有原始記錄可尋。相關的考古材料、文獻資料缺乏，使得運用考古學方法斷代分類，作較全面系統的研究十分困難。故宮佛像為研究藏傳佛像的歷史原貌，了解清代當時佛像來源、分類、名稱提供可靠的標尺文物。可以從中找到古代藏傳佛像產地、年代、質地等重要線索與依據，如「扎什琿瑪」佛像特點明確，為歷世班禪敬獻，可以肯定是後藏日喀則地區扎什倫布寺系統造佛工匠作品。「噶克達穆琿瑪」是原噶當派寺院工匠所做。「巴勒布琿瑪」是尼泊爾工匠製作。「紫金琿瑪」「桑唐琿瑪」佛像都具有鮮明特點等，使原本祇是古代藏文文獻提到的佛像分類名稱，得到實物證實，這對西藏佛教雕塑研究具



流崇干珞瑪（圖一五七）



噶克達穆珞瑪（圖一七一）



紫金珞瑪（圖二〇〇）

有重要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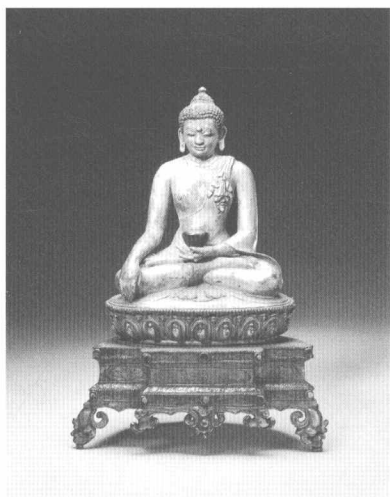
藏傳佛教有龐大的神系，神靈衆多，形象神奇，既有源於印度晚期佛教的密教金剛乘、時輪乘諸神，也有西藏原始本教神、漢地神祇、蒙古神祇，以及衆多的女神像、男女雙身像、凶忿像，遠比漢地佛像類型豐富。怪誕神奇的密教內容與複雜多變的造型是藏傳佛教造像的突出特點。要搞清每尊佛像的準確藏、漢名稱殊屬不易，尤其是漢名，故宮藏佛題記中有準確的漢文名稱，一些佛像還有漢、滿、蒙、藏四種文字名稱。不僅有常見的佛、菩薩，還完整保存全堂的密宗四部佛像，這是藏傳佛教最爲奧秘的部份，如故宮雨花閣、梵華樓佛像^⑧。貢獻最大的正是乾隆時期著名的高僧三世章嘉國師若必多傑，他爲藏傳佛教圖像學的系統化、規範化做出重要貢獻。不僅爲清代西藏佛教藝術在內地的傳播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而且對於現在的西藏佛教圖像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故宮佛像除去黃條佛龕題記外，還有大量的清代皇家檔案，主要在內務府《奏銷檔》《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等檔案中記錄佛像的收藏、製作過程，並且可以對照檔案記載查找到大量佛像的來龍去脈，這在西藏雕塑藝術史研究，乃至中國雕塑藝術史研究中都有特殊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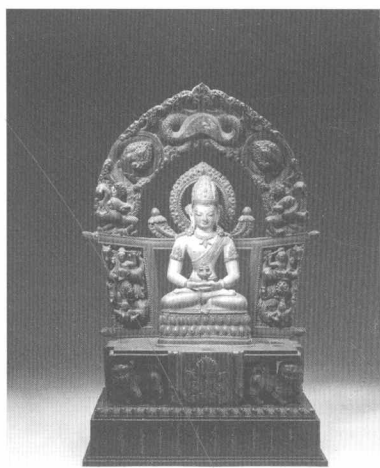
（二一）

藏傳金銅佛像鑄造所用金屬材料主要爲各種銅合金，一般分爲紅銅、黃銅、青銅，實際上所用銅的種類很多，藏語稱爲「珞瑪」（li-ma）。《藏漢大詞典》解釋其義「指各類響銅製品，又特指東印度銅佛像」。西藏衆多大寺院都有珞瑪拉康，即響銅佛殿，收藏寺內的貴重佛像，藏族人民對古代響銅鑄造的佛像，視爲比純金造佛像更爲貴重。據《五世達賴喇嘛傳》記載，五世達賴曾爲《布達拉宮響銅佛殿誌》撰寫書首禮讚^⑨。布達拉宮珞瑪拉康，至今收藏着大量珍貴的響銅佛像。

十六世紀的噶舉派僧人白瑪噶波（一五二七年—一五九二年）^⑩和十八世紀的晉美林巴都著有關於各種珞瑪以及印度、尼泊爾、西藏、漢地、蒙古各地佛像特點的著作^⑪。就



扎什琿瑪（圖一四）



紅琿瑪（圖一二五）

材質與風格對藏傳銅佛作了分類。《五世達賴喇嘛傳》記載：

『博學的上師曼卓班欽來到哲蚌寺，居住了一個多月，我向他請教如何識別

青銅、雜銅、漢地所造的新舊佛像，他給我作了詳細的介紹^⑫。』

可見西藏的高僧對於金銅佛像的材質產地早有研究，尤其是精通工巧明的大師。當代藏族學者扎雅在《西藏宗教藝術》一書中描述古代藏文文獻中記載的各種琿瑪及琿瑪佛像，引述如下：

『各種琿瑪：匝那卡西瑪、花琿瑪、白琿瑪、黃琿瑪、紅琿瑪、紫琿瑪、青琿瑪、鐘銅、姜銅、桑塘琿瑪、恰利。

依各種佛像最初製作的國家和地區分為五類：

一、印度琿瑪佛像，細分為中、東、西、南、北、丹群梅琿瑪佛像六類。

二、蒙古琿瑪佛像分四類：下部蒙古、上部霍爾、裕固、和田卡夏。

三、尼泊爾琿瑪佛像分為古代、近代、現代三類。

四、漢地琿瑪佛像分為唐代、明代兩類。

五、西藏琿瑪佛像分為六種：（一）上法王佛像。（二）中法王佛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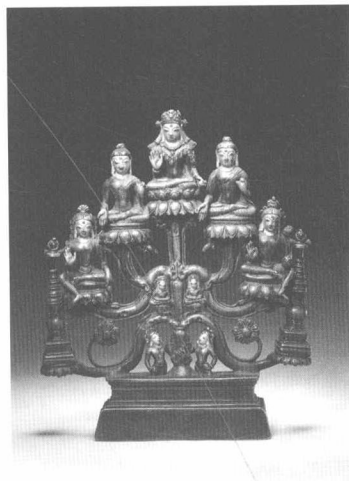
下法王佛像。（四）噶當琿瑪佛像。（五）來烏群巴琿瑪佛像。（六）白

瑪卡巴琿瑪佛像。此外還有幾種著名佛像：（七）多覺邊肯琿瑪佛像。

（八）扎什倫布寺琿瑪佛像。（九）德格琿瑪佛像^⑬。』

上述材料說明古代藏族人對金銅佛像的認識水平，其分類方法是從材料的多樣性，工藝的特點、造型風格、姿態服飾等細部的表現區分出不同產地與時代。至遲在十六世紀已有這方面的專門論著出現^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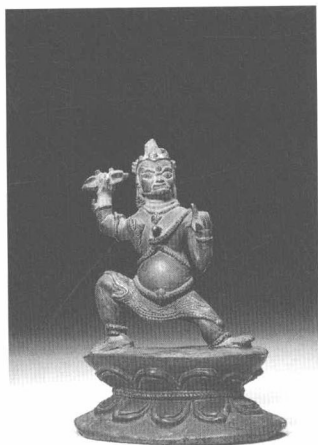
金銅佛像的類型特徵、時代特點如何，顯然僅憑文字描述沒有實物佐證難以解決問題，而故宮清代舊藏的大量藏傳金銅佛像恰為解決此問題提供了實物證明，可證實古代藏傳金銅佛像分類方法確實存在。



梵銅琍瑪(圖二二)



番造(圖一九九)



番銅琍瑪(圖六一)

清代宮廷中藏佛分類，據現存實物與題記及檔案記載統計有以下十六種名稱，這些名稱有的用漢、滿、蒙、藏幾種文字書寫。考察各種名稱佛像的造型、風格及工藝特點，其定名範圍與標準大體如下：

(一) 梵銅琍瑪 (rgya-gar li-ma)：即印度琍瑪，『梵』是藏文『印度』的對譯，印度風格造像，包括斯瓦特像，如圖六；克什米爾像，如圖二二；東北印度像，圖一〇、三四；尼泊爾像，圖一九、二〇；西藏早期仿印度樣式作品。如圖五四、六〇、九二。

(二) 梵銅舊琍瑪：所指範圍與梵銅琍瑪相同，標明『舊』字，說明年代久遠。

(三) 番銅琍瑪：即西藏琍瑪，是西藏本地作品，風格多樣，如圖六八、一八〇。

有些與梵銅琍瑪像類型一致，是西藏早期仿印度作品。

(四) 番銅舊琍瑪：多為十五世紀前年代較早的西藏本地作品。如圖六二、七九、八四。

(五) 番造：所指與番銅琍瑪一致，明確指明西藏所造如圖三七、八〇、一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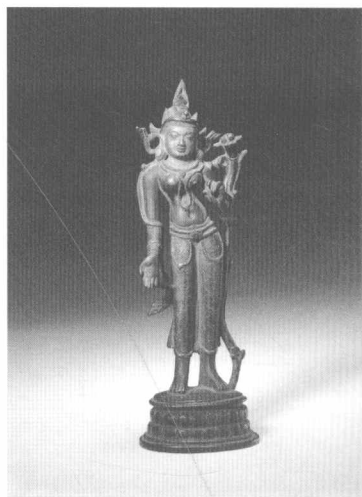
(六) 巴勒波琍瑪：即尼泊爾琍瑪，清代藏語中稱尼泊爾為『巴勒波』，亦譯為『巴勒布』。如圖九八，約為十五世紀尼泊爾風格作品。有的與西藏本地作品沒有區別，如圖一三四。

(七) 桑唐琍瑪：標此名者多保留有印度帕拉王朝及尼泊爾造像風格特色，其工藝特點鮮明，銅像上鑲嵌白銀、紅銅，以裝飾五官、璽珞，項鍊，或用幾種不同顏色金屬合鑄。主要材料為黃銅，造型優美、工藝精湛。如圖二、二六。一些西藏作品也標此名，如圖九三、九六、一一五。

(八) 紅琍瑪：圖一二五，為十五世紀尼泊爾風格像，銅色為淺咖啡色。

(九) 黃琍瑪：清宮檔案中有記載，保留題記的佛像尚未發現，有待考證。

(一〇) 扎什琍瑪 (bkra-shis li-ma)：即扎什倫布寺琍瑪，日喀則扎什倫布寺作品，為歷代班禪所獻，如圖一四一。



巴勒波琍瑪（圖九八）

（一一）紫金琍瑪（dzi-kishm lima）：有西藏作品也有乾隆時期宮廷仿藏作品，選用多種貴重材料合金鑄造。黝黑顏色中泛出紫色瑩光，如圖二〇〇、二四六。

（一二）噶克達穆琍瑪（bod-li rnying-pa）：『噶克達穆』即『噶當』的異譯，標此名稱的銅像，是噶當派寺院製作的佛像，造型與其他西藏作品未見明顯區別，如圖一五二、一七一。

（一三）流崇干琍瑪：『流崇干』是藏文音譯，據陳慶英先生考證是 slevu-chung-gi 意為『來烏群的』，即『來烏群巴琍瑪佛像』（Slevu-chung-li-ma），《一世達賴喇嘛傳》記載，『來烏群巴』應是十五世紀中期西藏拉薩地區的著名工匠，曾主持建造扎什倫布寺強巴佛大銅像（一四六四年建成）^⑮。圖一五六、一五七、一七二，均為十五世紀西藏作品，造型工藝與其他作品未見獨特之處。

（一四）利益新造：乾隆時期宮廷新造佛像，如圖二二五。

（一五）銅胎利益佛：同治、光緒年間名稱，已無鑒定意義（本書未收）。

（一六）利益漢像：漢地佛像（本書未收）。

清代宮廷藏佛分類特點：一、『梵銅琍瑪』、『梵銅舊琍瑪』、『番銅舊琍瑪』、『番造』、『巴勒波琍瑪』是按產地劃分，與藏文文獻中分類一致。漢地、蒙古琍瑪沒有標名，因年代久遠，大量題記未能保留下來。二、『紫金琍瑪』、『紅琍瑪』、『黃琍瑪』、『桑唐琍瑪』是根據銅質與工藝特點所定。三、『扎什琍瑪』、『嘎克達穆琍瑪』則按教派寺院定名。四、『流崇干琍瑪』是著名工匠的作品。比較藏文文獻與清宮銅佛實物分類，兩者大體一致，從故宮現存佛像黃條、佛龕題記統計，多數標名為『梵銅琍瑪』、『番銅琍瑪』（包括梵銅舊琍瑪、番銅舊琍瑪）兩類，其餘名稱是少數，由此可見，藏傳金銅佛像中就其造型、風格總體概觀，主要分為印度與西藏本地兩大部分，反映古代藏族人對銅佛像的實際認識。以今天考古類型學標準衡量，雖然存在着標準不一，含義寬泛等不足，但它反映了藏傳金銅佛像的歷史實際情況。古代藝術品研究，首先是復原研究，古代藏族人從材料與風格來區分銅像的方法，是我們今日研究的基礎。



桑唐琍瑪（圖二六）